

史志琼崖

【编者按】

由武汉光谷山水公益基金会资助、海口菡萏湿地研究所执行的为期一年的“海南省海南兔监测调查”项目近日结项。调查报告表明，受多重因素影响，海南兔种群整体呈衰退态势，但本次野外调查也收获惊喜，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在琼北的文昌地区再次发现了海南兔的踪迹。



1870年，英国人史温侯报告中海南兔的彩绘图。辛世彪供图

史温侯为海南兔定名的博物学家

“兔，梵书名‘舍迦’，大如狸，褐色，尻有九孔，舐雄豪而孕。其大者为鼯(chán)，色青，足似鹿，琼人多畜之。”这是清代道光年间纂修、成书于1841年的《琼州府志》对海南兔子的记载。从这段简短的文字可知，晚清时期，生活在海南岛上的兔子中既有野生的，也有被驯化家养的。结合后世的记录和描述，褐色的兔子应该就是野生的“海南兔”。

跃跃兔兔方志里的琼州古记

我国历代不乏对兔子的诗文歌赋，最早的恐怕是《诗经·小雅·巧言》，其中有“跃跃兔兔，遇犬获之”之句，矫捷机灵的兔子，也难免有被猎犬捕获的遭遇，成为先民的盘中餐。海南历代方志对本土野生兔子均有记载，只是文字不多，包括现存最早的明代正德年间成书的《琼台志》，都记录到海南有兔子，但也只有一个字——“兔”，而没有更多的介绍。《诗经》中提到的“兔兔”，在道光《琼州府志》中被细分为一大一小两种兔子，小的为兔，大的是鼯，皮毛的颜色也不同。



在东方抓拍到的海南兔。林树浩 摄

“海南兔是一种独居动物，在夜间或黄昏时活动。它不生活在洞穴里，而是躲在灌木丛中。它喜欢生活在有许多灌木丛的平坦、凉爽的土地上。”

这是1870年，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史温侯(Robert Swinhoe, 1836—1877)在其《海南博物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Hainan)一书中对海南兔的部分描述文字。正是因为史温侯的描述和发表，海南兔不但在英文世界有了自己的名字Hainan Hare，而且有了专属的拉丁文学名Lepus Hainanus Swinhoe，其中Swinhoe为描述和发表者罗伯特·史温侯的英文姓氏。1854年，年仅18岁的英国人罗伯特·史温侯奉派来到香港，接受中英翻译训练后，开始了将近20年的公务员生涯。他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史料，甚至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邹和”。史温侯先后在我国香港、澳门、厦门、上海、台湾、宁波和烟台等地任职，直到1873年因病返回伦敦，1877年病故。史温侯不只是一名单纯的英国政府公务员，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对动物、植物、地理、民族和人文领域均有涉猎。

1868年初，史温侯结束了在台湾的任职和物种调查后，获得上级批准前往海南岛，从海口港上岸，自东向西进行环岛鸟类资源调查。

史温侯在琼州府城时，一位官员的儿子送给他一只海南野生兔子。他仔细测量，并将兔子进行解剖研究后命名。1869年12月9日，史温侯在伦敦动物学会的年会上宣读，并发表在1870年的学会学报上，海南兔被正式命名为Lepus Hainanus Swinhoe。

史温侯如此描述海南兔：“海南兔是海南岛特有的一种野兔……海南兔很小，体长不到40厘米(16英寸)，体重只有1.5公斤(3.3磅)。它的头又小又圆。它有长耳朵，比它的后脚长。尾巴的上半部分是黑色的，下半部分是白色的。它的皮毛比大多数其他野兔更鲜艳：背部是棕黑色和白色，腹部是白色，侧腹的皮毛是棕黄色和棕白色的混合物，四肢是深褐色。”

这段描述文字写到海南兔的褐色皮毛，与道光《琼州府志》对本岛野兔的记载基本一致，从关键字眼判断，先人记录的与史温侯描述的，应是同一物种。

史温侯还了解到，海南兔主要分布在海南岛西部的干燥草原上，不喜欢生活在山区或农田。而从方志的零星记载，在更久远的古代，海南岛上的野兔是随处可见的。

史温侯还注意到，当时海南兔被宰杀取皮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仍在继续，此外，它们也受到栖息地丧失的威胁。“海南的大部分栖息地和动物都受到类似因素的威胁，比如‘海南黑冠长臂猿’(今称海南长臂猿)，它是世界上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之一。”

遗憾的是，史温侯对海南兔的描述和发表只是在他调查鸟类时顺便而为，并未进行深入的专项调查。

种群告急从常见野兔到保护物种

国内迄今为止对海南兔所作的专项监测调查，此次尚属首次。

人们似乎在发现海南兔越来越少之后，才开始怀念它们一度频现的身影。

来自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世纪50、60年代海南岛的北部、西部和南部广大郊野，几乎到处都有海南兔，是该岛各地的常见种。由于当时民间有猎取食用的情况，部分地区夜间狩猎，短时间内即可捕获数只，彼时种群总量估计在万只以上。由于荒地开垦和长期捕杀，20世纪70年代之后海南兔越来越少，那种用木棍也敲得到的地区，是灭迹最快、最早的地区。截至2009年，仅在海南岛西南部等个别尚未完全开垦的荒野角落，以及少数保护区里尚有踪迹。

海南兔性情温驯怯弱，御敌能力差，通常以逃跑、跳跃和藏匿等方法躲避敌害，晚上在电火把照耀下，会呆立不动，极易被射击。正是因为它性情温驯怯弱，成为了众多非法捕猎者的目标。大量的捕猎及滨海地区大面积垦殖，导致海南兔栖息地破坏，栖息环境缩小，造成它们数量锐减。

1989年，海南兔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996年，海南兔被列为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易危物种；2021年，海南兔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但令有识之士担忧的是，尽管海南兔早已被列为濒危物种，部分群众对其仍知之甚少，猎杀行为与栖息地遭破坏的威胁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因此，开展生态科普宣传，强化执法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



红外线相机在昌江记录到的夜间出来活动的海南兔。海口菡萏湿地研究所 供图

邹韬奋不掠人之美

■ 陈佳

1923年，邹韬奋进入黄炎培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任编辑股主任。1926年10月，他接手了一份小刊物——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生活》周刊。彼时，周刊仅是一份一四开的小型刊物，发行量只有2800份，多以赠阅形式分发至职教社社员与教育机构，在市面上几乎没有什么声响。

邹韬奋经过深思熟虑，以“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为办刊宗旨，确立“以读者为中心”的办刊路线，不断革新内容，陆续增加“小言论”“事业与修养”“人物记述”“读者信箱”“本周要闻”“萍踪寄语”等栏目，使杂志从一份职业教育刊物跃升为综合文化杂志。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刊物的口碑与销量节节攀升。至1932年时，发行量已高达15.5万份，一时间“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该刊物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刊物声名鹊起后，很多读者乃至业内人士都误以为邹韬奋是该刊的创办者。面对这份意外的美誉，邹韬奋并未顺势接受，而是在《二十年来的经历·现实的教训》中“为己正名”，写道“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周刊并不是由我创办的”。这句话后来也成为“掠人之美”这一成语的经典用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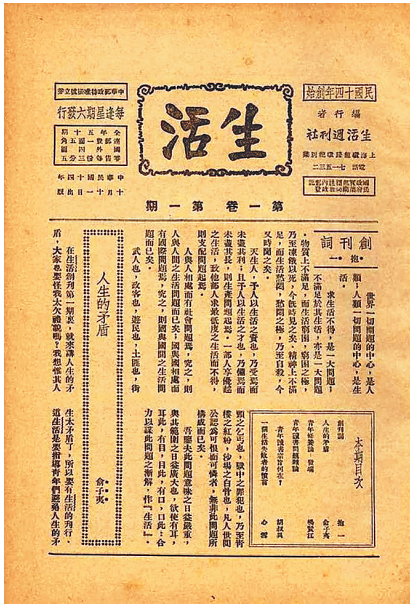
原来，《生活》周刊于1925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首任主编为王志莘。王志莘本身是教育家，同时深耕金融领域，《生活》周刊出完第一卷后，因他去工商银行担任储蓄部主任，邹韬奋这才接过编务。

不仅如此，邹韬奋在《经历》一文中还特别提到，他在接手之初对刊物定位并不清晰，是原编辑班子留下的“服务精神”底色给了他重要启发。他这样写道：“我对于《生活》周刊的革新，虽尽了一部分的努力，但若无前人的基础，恐怕也未必能有后来的发展。”这番话，将部分功绩明确归于前任，把刊物的成功看作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结果。

“读者信箱”是周刊最受欢迎的栏目，邹韬奋作为主持人，总是亲力亲为地对待每一封来信。实在遇到编务繁忙时，部分回信便交由徐伯昕、胡愈之等同事代笔。这份光环，邹韬奋同样也不肯独占，专门在回忆录中点明：“信箱的繁荣，决不是我一个人所能为力。”

其实，以邹先生之盛名，即使不作解释，也无人会去较真。他亲手铸就了刊物的辉煌，却不掠人创办之美，不隐前任奠基之功，不掩同人协作之力，实事求是，不慕虚名，尽显老一辈文化人的坦荡风骨。

这份清醒，放在今天依然值得深思。



1925年创办的《生活》周刊创刊号。资料图

小糖纸藏大气派

■ 张意薇

一张大白兔奶糖的糖纸，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意外出了圈。一位海外博主晒出这张极筒配色、端坐一只白兔的老包装，直呼是“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对中国人来说，这不过是课本里夹过、还带着点奶味记忆的旧纸片；可放到世界面前，它倒真成了一张不用翻译的名片。

中国糖纸的变化，首先是从手感开始的。二十世纪初，上海、广州一带的机制糖果工业刚起步，糖纸开始采用涂蜡薄纸，防油防潮，单色或双色印刷，素净得近乎寡淡。1960年代中期以后，玻璃纸进场，与蜡纸并行，颜色亮丽不少，图案也跟着放开手脚。改革开放后，铝箔复合纸、塑料复合膜陆续上阵，金属反光加上更精细的印刷，糖纸开始有了更多的光泽和层次。再往后，镀铝膜、镭射膜、珠光膜……材质越来越讲究，图案也越来越花哨。

有意思的是，材质一路往前跑，有些老糖果的包装图案却偏偏停在原地。乌镇、九江、钟祥一带的传统酥糖，到今天还守着蜡纸：包装上大多只印粗犷边框及品类名称，如猪油酥糖、玫瑰

酥糖等，纸被油脂浸得半透明，摸上去温润软塌，素净里透着股实用主义的朴拙气。海南某品牌椰子糖里，也有这样的“老面孔”——白底上简约的红色椰子树，周边大片留白，仿佛中国糖纸最南端的一个极筒注脚。

守拙之外，另有一条趣味动线更精彩。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爱民糖果厂的奶糖还延续着米老鼠图案。民族化包装的呼声一来，白兔顶了上去：它端坐正中，双耳竖起，前肢并拢，轮廓一圈蓝线，内部不着色，全靠蜡纸的暖白底透出白来；糖纸两头用于扭结处各有一排连续的兔形剪影，和主图的兔子遥遥呼应。这个形象去掉了拟人化、立体化的描摹，扁平到近乎抽象，反而躲过了潮流的保质期——此后几十年，构图和姿态几乎没动过，成了中国糖果包装里辨识度最高的一幅图案。

玻璃纸一透明，糖纸的画面也有了新的玩法。杭州农工食品厂的西湖奶糖“断桥残雪”款，玻璃纸通透如宣纸留白，淡蓝的断桥与远山疏影晕染其间。松柏点缀，借景入框，虚实相

生，一方糖纸竟藏江南胜境。天津利华食品厂的百花戏剧糖纸更热闹：中间若干脸谱沿波浪线错落排布，红花藤蔓点缀两侧，通透轻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糖纸上的题材光谱相当驳杂。国营上海汽水厂苹果奶糖两侧印着吊塔、炼钢等工业图景；北京市第一食品厂的红茶奶酪曾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推出运动题材糖纸；青岛食品厂的花生酥糖上还印过《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等革命样板戏题材；伟多利食品厂的“小英雄奶糖”以武松打虎为主题，既是传统故事，也呼应着当时的英雄叙事。

糖纸上的动植物与图案，常常寄寓吉祥彩头。金鱼是“金玉满堂”，鸳鸯是“百年好合”，凤梨在闽南语里谐音“旺来”，橘子取的是“大吉大利”的口彩。天津良友糖果厂的吉庆奶糖，把年画里“娃娃抱鱼”的吉利画放进红黄绿条纹的框子里，热烈张扬；北京义利食品公司的鸳鸯奶糖，蓝绿的水波托着游弋的鸳鸯，图的是和美圆满。这些符号并非某个品牌独有，而是同一套民间吉祥符号在不同厂家、不同品类之间流动

使用。

糖纸的设计元素，也反映地域物产与工艺。长春老茂生糖果厂的鹿茸水果糖，把“东北三宝”直接印上包装；哈尔滨秋林糖果厂的酒芯糖包装不同于常见的双端扭结，而是采用单端扭结：一端平封，一端旋出“耳朵”，整体呈子弹形，糖纸上往往还印着“北大仓”“花园大曲”等酒品名称，一张糖纸便是一张地方特产名片。

物资紧俏的年代，糖纸还有过第二重身份。孩子们将它展平，夹进书页；也会折成小人，编作门帘，串成链条。东北不老林糖果的彩色条纹糖纸，纸质挺括，泛着光泽，折出的舞者裙摆蓬松，立在桌上，或套在指间，便是一出小小的人偶戏。

海外网友为大白兔糖纸叫好，赞的不仅是设计，更是设计背后那种不迎合、不张扬的气度。小糖纸里，藏着大气派——这份气派，正被世界看见。

寻觅海南兔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文化热点